

· 美国文学史论译丛 ·



RADICAL VI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
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

——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

[美] RICHARD H. PEBBS 著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美国文学史论译丛 ·

RADICAL VI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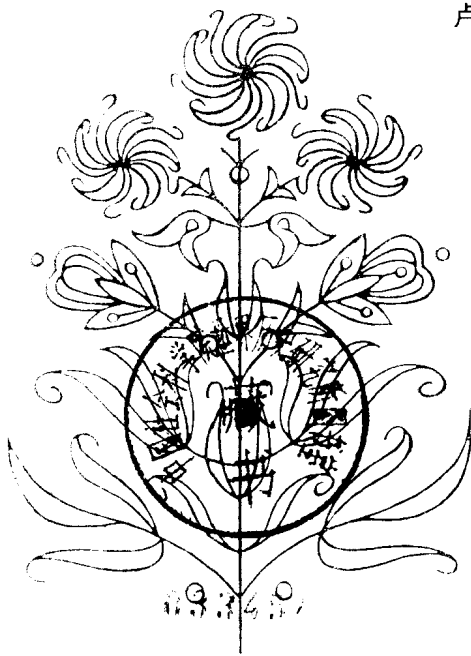
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

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

[美] RICHARD H. PELLIS 著

卢允中 严赓芸 吕佩英 译

卢允中 校订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1

沪新登字 203 号

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

卢允中 严榭芸 吕佩英 译

卢允中 校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欧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17.875 印张 446 千字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1009—640—0 / I · 047

定价: 12.00 元

出版说明

《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是一部研究本世纪 30 年代,在世界性经济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美国文化界与当时社会思潮及政治运动关系的著作。作者理查德·H·佩尔斯收集和引证了当时美国文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对这一历史时期美国的文学主流作了评述。正如中译本序的作者迈克尔·赫尔方教授所指出的,“佩尔斯的研究并非纯粹的文学史”,“他是一位研究历史的知识分子,他着重研究激进的社会思潮。对他而言,文学不过是他感兴趣的一些论题中的一个而已。”本书涉及面极为广泛,也较详尽地反映当时美国各种观点的变化。

本书作者较为全面地反映 30 年代美国文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看法,其中褒贬不一,有些看法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冠以各种错误的字眼。这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那天起就受到辱骂、歪曲和攻击,它是在同各种错误观点的争论中,逐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和掌握的。我们相信广大读者能对书中的各种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

本书还涉及到当时美国文化界对 30 年代苏联发生的某些事件和人物所作的各种评价,但这些评价只是从美国的角度提出来的,与当时世界各国、各阶层的各种评价相比,只能是百家中的一家之谈。时至今日尚无统一的认识与结论。诚然,对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件和对人物作出评价是需要用历史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和

评估的,只有基于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全面和切合实际的结论。

本书的结束语中,作者提到当时“许多作家夸大了美国人民的革命意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同时又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韧性和持久性”,“在这个时期里人们所看到的不是旧世界的死亡,而是自由改革的再生。”这正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有时甚至会出现倒退,但并不足以证明某种社会制度的永恒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曲折或倒退毕竟是短暂的瞬间。本书对研究近代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和高年级本科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系美国匹茨堡大学英语系教授、文学博士迈克尔·赫尔方(Michael S.Helfand)于1979年夏至1980年夏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期间推荐出版的《美国文学史论译丛》之一,他为本丛书中译本的出版撰写了序言。《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已列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美国学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科研项目。

1990年11月

中译本序

理查德·H·佩尔斯的《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1973年)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共八卷)中的第六卷。关于该丛书的总序见罗伯特·斯皮勒所著《美国文学的周期》。斯皮勒在序中对本世纪美国文学史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他的总的看法,对希望进一步了解本书内容以及丛书的涉及范围和论述主题者应有所裨益。佩尔斯对30年代文学和思潮的研究阐明了其中若干主题:它着重评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主流,把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及知识界联系起来,因此成为编纂美国文学史方面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

然而,严格说来,佩尔斯的研究并非纯粹的文学史。他的副题表明,他有一个广泛得多的探索领域: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包括了电影、纪实文学(书面的及拍成电影的)、剧团以及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作品。他往往以很具体的方式说明存在于这种文化与当时“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佩尔斯并非把历史看作是研究伟大作品的“背景”。相反,他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主要决定于他对30年代经济崩溃及社会危机所引起的重大历史动态的解释。他是一位研究历史的知识分子,他着重研究激进的社会思潮。对他而言,文学不过是他感兴趣的

一些论题中的一个而已。

佩尔斯的这部作品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是 60 年代后期大量涌现的所谓“修正主义”历史观的一个范例。这种历史观对当时盛行的从“冷战”观点解释美国现代史的倾向提出挑战。《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对 30 年代作出详尽的述评（沃伦·萨斯曼率先对 30 年代作出这种带修正主义色彩的解释）¹，它对丹尼尔·贝尔在其《意识形态的没落》中所倡导的理论提出挑战，贝尔认为左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们过于重视意识形态。萨斯曼在其近作“30 年代的文化”一文中重新阐明这种观点：“这 10 年也因信奉‘意识形态’而应受到批判，但可惜的是我们对此不能作出评论，因为事实上没有足资证明这种信奉的证据。更确切地说，这 10 年中最突出的缺点看来是单纯代替了一切意识形态，而实际上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²

佩尔斯把这本书献给萨斯曼，他说，“萨斯曼的许多观点在本书的论点中得到反映。”³ 其中一个观点就是知识分子过于轻易地舍弃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他说，“他们的世界观和思想（尤其是在 1935 年以后的年代里）含有一种潜在的保守主义。30 年代早期形成的立场有很多可以用来改变或加强存在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后一种趋势在这 10 年的末期尤为突出。因此，我认为 30 年代的知识分子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复杂的，但对社会理论又都是仇视的，在艺术上主张实验，但同时又渴望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对美国的传统理想既持批判态度，又予以支持。”显然，这种分析是修正主义的，因为它暗示，既爱又恨的心理和矛盾，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纯正或严正，最能说明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特性。而且，佩尔斯的解释带有一种相当微妙的讽刺意味：当他提到“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分子，如贝尔和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 30 年代的左派人物过于重视意识形态，并批评他们不能接受生活中的模棱两可的事物、各种矛盾或似非而可能是的论点

的时候，他实际上在暗示历史情况完全是相反的。

带有“冷战”观点和带有“修正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对 30 年代到底是谁以及到底是什么失败了这个问题的论战与 60 年代席卷美国各大城市和大学校园的较大规模的论战是有联系的。正当佩尔斯在埋头撰写此书时，越南战争已构成对美国的强大压力，在社会上引起或加剧种种分歧，触发各种争端并几乎使每个人都感觉到美国并不是在解决它的社会问题。在《意识形态的没落》（1960 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认为，实用主义的“非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分子在一个实行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里扮演社会工程师的角色可能比知识分子理论家更好地解决贫困、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等问题。在 50 年代，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这种情况的确是在发生，但到了 60 年代后期，由于战争以及与战争有关的危机相继暴露了自由主义在战后年代所遭遇的失败和面临的矛盾，贝尔的主张看来不过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梦想而已。

萨斯曼和佩尔斯（以及其他修正主义者）都对当时的自由主义哲学观点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实用主义加上争取社会认可和成功的愿望比之任何意识形态的热情更有可能促使知识分子默认那些“最终得以避免”解决大萧条年代许多主要社会问题的社会安排。60 年代的社会危机以及两个主要政党中务实的自由主义分子均无法解决这些危机，这个事实为人们提供了必需的动力，让他们得以对内部社会动乱的最后一个伟大时期重新进行评估。佩尔斯的《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挽救了意识形态，使之摆脱了它在贝尔对这个历史阶段的解释里所处的替罪羊的地位，从而也为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批评取得合法地位。他写道，“对 30 年代的争端和激情进行重新研究的任何努力不可避免地成为对当代问题的评论。”

然而，佩尔斯的分析绝不是片面的。他没有把具体的人或立场说成是好的或坏的，正确的或错误的。他对丹尼尔·贝尔之流

的战后的自由主义分子的评价提供了一个说明他怎样对待和他意见相左者的良好范例：

我往往怀疑他们脑子里的想法和采取的立场。我确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过于急切地接受既定的习俗成规，他们不愿重新评价冷战外交，他们倾慕领袖和专家所起的作用，乐于与麦卡锡主义合作，同时又摆脱不了中产阶级在心理上和道义上所遭遇的痛苦——这种感情上的倾向最终导致他们忽视都市生活的腐朽、种族歧视和贫困等全身病。

但我也异常钦佩他们言谈中提到的许多东西。我认为他们对社会现状既非自鸣得意的辩护士，又非卑鄙的辩护士……我认为他们提出的社会批评比我们在30年代或60年代的宣言中所能找到的更具挑衅性、更富想象力……。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当中的后来者深受他们的恩惠，即使在我们试图超越他们的观点的时候也是如此。⁴

这段文字揭示了佩尔斯的整个作品中那种典型的彻底性和知识分子的慷慨大度。诚然，他作出的评价对我来说似乎有点过于繁琐，因此我对其中若干部分略去不谈，而他的慷慨大度是如此的感人以致一位书评者在看完《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后感叹道：“如果说许多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因按先入之见来探讨问题而应受到诅咒，那么我们倒希望佩尔斯让他的种种先入之见起到更大的影响。”⁵ 不管怎样，对研究这个历史时期及其文学但又缺乏第二手资料的学生或教师而言，佩尔斯的彻底性和慷慨大度却使本书成为一本良好的入门读物。另一位学术性刊物的书评家写道：此书不仅论述范围“广泛全面”而且“文笔流畅，它理应成为反映证券市

场崩溃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的最完美的记录……。佩尔斯之如此善于处理 30 年代知识分子的复杂生活是本书的最大优点。”⁶

那么，作者在书中如何立论？其牵涉面又如何？上面已经提到，本书的总的结构相当复杂，但它很能说明问题。首先是按年代顺序的编排：佩尔斯在作为开场白的第一章介绍了 1929 年以前的激进主义，随后是三章分别论述 1929—1935, 1935—1939, 1939—1941 三个阶段的情况。这样的编排不是任意决定的，它体现了佩尔斯对激进思想在这 10 年中迭次变化的全面分析。作者在前面三章中论述了一些左派作家的重要著作，经常就他们对社会问题或历史事件所采取的立场进行比较。他把其中一些左派作家看作是诸如《新群众》、《新共和》、《民族》等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全国性刊物的代言人。他往往集中反映同一作家（或杂志）在这 10 年中前后发表过的意见，从而使他的研究带有连贯性。因此，这些篇章与其说是对某些知识分子的作品概括，倒不如说是对某些知识分子头面人物的历史的评述。也就是说，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想些什么”，而是某些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埃德蒙·威尔逊或 V·F·卡尔弗顿在某个时期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政党或政治刊物所采取的政治立场。

在论述 1929—1935 年这个历史阶段的一章中，佩尔斯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已制定一个既激进又相当实际的纲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知识分子必须缓解存在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共同性的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状态。读者在本书中可以觉察到这种矛盾状态的存在，它自始至终持续不断地在佩尔斯描绘的作家身上以及佩尔斯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里产生着影响。这个阶段的作家汲取大萧条之前已经形成的思想，他们倡议某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并批判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带有自由主

义—实用主义色彩的“新政”策略，他们据以批评这些“新政”策略的理由是：它们既未能有效地对付经济和社会危机，同时又促使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化和垄断化。不过，这些理论的若干方面，诸如激进社会无法摆脱政治上那种持续的软弱无能的状态、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驱使激进分子与不太激进的中产阶级结成联盟、激进分子为了坚持实用的观点和方法不惜牺牲意识形态以及他们深信专门的技术知识足以解决社会问题等等，有可能而后来也确实产生了保守的后果。

第二个阶段，即 1935—1939 年，是美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激进主义在美国国内获得最广泛支持的历史时期。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其部分原因是作为这 10 年中推行激进策略的先锋队伍的美国共产党突然停止了攻击“新政”的国内政策，转而强调存在于它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共同事业（或“人民阵线”），以便共同对付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地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这个阶段里还有过一段弥漫着祥和气氛的日子，那时激进主义分子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支持了他们和美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事业从而改善了他们与各种社团和组织之间的疏远关系。

在该章题名为“意识形态的没落”的一节中，佩尔斯指出这种保守主义的形成有其他的更带根本性的原因。他说，“美国人民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归根结底受到大萧条本身的性质的决定性影响——大萧条引起的特殊问题、人民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它们看来需要人们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等等。他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对大萧条的感受都象是经历了一次“分崩离析”，他们渴望的不是改革而是复苏或稳定。他们需要的是保存，不是革命；是共同性，不是分裂。他们渴望恢复昔日拥有的东西——或者是他们认为曾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愿把社会危机当作是一次创建一个新的、不同的社会的机会。

第三个阶段，即 1939—1941 年，对美国的激进主义来说，是

一个日益觉醒并走向分裂的时期。凡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说，都是对苏联内部变化以及世界各国共产党按苏联的意旨改变策略的反应。美国激进分子中一些人——他们的人数肯定不多——反对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国内所产生的保守影响。对其中一些人来说，他们因看到斯大林放逐莱昂·托洛茨基以及30年代末莫斯科清党审判而感到幻想破灭。对许多人来说，斯大林多年来一再重申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坚定立场之后竟决定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对他们的信念的一次毁灭性打击。总而言之，斯大林时代那种玩世不恭或机会主义的内政外交策略以及可以用苏联的激进主义社会变革的成败来估量其他各国是否可以进行激进主义社会变革的设想使许多美国人最终放弃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激进理想。此外，随着美国开始生产军需物资，国内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人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与克敌制胜密切相连的实际问题。30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终告结束。

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各章阐述了变化中的历史形势并概述了——即使不是全部——当时的社会思潮。另外一章——“共同性的探索”——专门论述了一种特殊的理想。这种理想超越了经济和政治理论的范畴而涉及19世纪在欧洲已开始发展起来的“文化”分析与批评的传统。⁷文化领域的理论家和评论家不同于经济或政治领域的理论家，前者把人民的整个生活方式作为研究对象。作为评论家，他们按通过所有社会结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按社会的物质财富或生产力或任何特殊的政治安排，来衡量文化的质量。佩尔斯在这一章中提出了各种建议，以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取代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占有优势的个人主义。他论述了这些集体主义理论具有的既起解放作用又起镇压作用的种种可能性以及这种矛盾所引起的政治问题。在佩尔斯心目中，一些最优秀的激进主义思想家曾试图采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传统中似乎最适合于资本主义之后的文化的思想”。对

他们而言,这意味着舍弃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创建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但这也意味着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分享和合作的公有理想。这些思想家希望从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挽救个人自由表现和辩论的价值,保存自由主义传统中抵制教条和盲从的倾向以及把假设和试验作为促进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工具的做法。佩尔斯认为发展这种“新意识形态”的五位作家(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西德尼·胡克、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以及文化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是一代美国激进思想家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五位作家要求于美国人的其实就是同时考虑到两种相对立的理想。在大萧条和战争的影响下,这种做法是一般的人或知识分子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的”。

本书的另外三章集中论述这个阶段的“文化”:文学理论和激进主义评论家的任务、小说和纪实小说以及激进戏剧和大众传播电影。在这几章中佩尔斯偏离了知识分子史这个“学术”性主题,但我深信他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可以在这种形式的论述中找到主题与语气的连续性,而且在纽约和好莱坞(当时的出版业和电影业中心),左派评论家和创作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即使他们并不一定相互认识,他们也熟悉彼此的作品。尽管佩尔斯在书中略去流行的社会思潮而代之以大众文化(即关于好莱坞电影的一章)似乎有点不合逻辑,但他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电影对美国人民当时的心态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阅读丛书另外几卷的读者可能对本书有关文学评论家的那一章特别感兴趣。在这一章中,佩尔斯论述了作为文学家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埃德蒙·威尔逊、马尔科姆·考利和范·威克·布鲁克斯等人。在国家面临危机之际,评论家自然想知道,文学到底能否发挥作用,特别是作家的职责是什么。如果人们得出不同的答案,那是不足为奇的,但这些答案之间毕竟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

在严峻的社会危机面前，评论家和作家往往抛弃流放者的生涯和艺术试验，而这些正是上一代的现代主义者（即W·B·耶茨、詹姆斯·乔伊斯和埃兹拉·庞德等象征主义者）视作理想的事物。他们多少带着老于世故的态度明确地表明他们重新进入美国社会的愿望，他们希望成为一个较大的群体、阶级、运动或社团的一部分。他们以是否能实现集体目标而不是以个人是否成为成功的艺术家或评论家来衡量专业成就。不管怎样，他们往往和上一代的艺术界人士不同，拒绝承认艺术与文化本身可以拯救社会。事实上，文化的价值取决于社会的形式。

许多变奏曲都是按照这个主旋律演奏出来的。如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塞尔的城堡》和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等具有永恒价值的批判性作品都带有和今天不大有人阅读的作品基本上一致的思想。迈克尔·戈尔德和约瑟夫·弗里曼采取了与共产党相似的立场，认为作家必须有意识地站在工人的阶级立场上，而不少作家之故意改名换姓以显示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忠诚确实是美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事例。一些作家，象戈尔德等人，认为他们应该接受党纪的约束，放弃他们的独立见解而成为致力于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技师。

佩尔斯论述的对象也不局限于左派人物，他描绘了诸如艾伦·塔特和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等保守主义评论家所持的立场。塔特是一个名为“亡命者”的文学团体中的诗人，他们在美国南方工业化前的农民文化中发现了他们的社会理想，而克鲁奇是个不相信人类或社会有朝一日可臻完善的现代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两人都相信伟大的文学是没有时间性的，也是不关心政治的。但这些人，和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当时置身于批判性意见的主流之外。

但有许多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包括当时的威尔逊和考利，认为作出不受约束的判断始终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功能，不

管他们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义务。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存在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义务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佩尔斯所钦佩的都是那些和威尔逊一样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理论答案的作家。威尔逊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榜样为依据，声称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应该吸收并超越当代的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评论家和作家一样，应该成为“最终价值的守护人”，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成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最终目标的充分发展的人类文化的守护人。负有这种使命的作家无疑会发现，在这样的乌托邦成为现实之前，自己将处于与掌权的任何政府或机构相对立的地位。

佩尔斯在论述这个阶段的纪实文学和小说的一章中采取了和前面几章相同的方式断言：作家创作激进主义小说时总是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受到保守主义的强烈影响。“使艺术带有社会意义的要求结果反而导致了个人感受性的文学，这是不足为奇的”。为了支持这个论点，佩尔斯分析了一些这个时期畅销的小说（如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战地钟声》、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詹姆斯·T·法雷尔的《斯塔茨·洛尼甘》以及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部曲《美国》），同时也分析了一些当时并不畅销的、被遗忘的但后来又作为文坛佳作而受到重视的作品（如亨利·罗思的《称它为睡眠》、丹尼尔·富克斯的《威廉斯堡三部曲》以及纳撒尼尔·韦斯特的《蝗虫之日》）。

在我看来，用这种方式提出论点不是无懈可击的。譬如，人们可以说，在这10年中原来并不畅销而只是在后来才被显然带有反意识形态倾向的文学组织重新发现的小说并不能象当时的畅销小说那样反映历史基调。而且，佩尔斯忽略了一些小说，如托马斯·贝尔的《严峻的考验》、威廉·阿特韦的《锻炉上的血迹》或迈克尔·戈尔德的《没有钱财的犹太人》，都是一些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主题而且可以作为反面例子提出的作品。这些作品经常是因

为“美学”的理由(意识形态是审美观的一种缺陷)而被排除在这个时期的真作之外。毫无疑问,还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小说有待今后人们去发现。

但佩尔斯即使是在阅读这种小说的时候,他的审美观似乎还是受到 50 年代和 60 年代那些反意识形态的批判标准的决定性影响。当他声称激进小说的革命性结局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时候(他这样说是为了表明这些小说其实并不是真正激进的),是不是反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已经在他脑子里扎下了根呢?

最后,我认为佩尔斯对真正的激进小说所下的界说未免过于狭隘,它因此排除了一些很可能对当时的读者产生真正激进影响的作品。譬如说,如果小说叙述一个面对危机时“按其自己的内在力量和信念”行事的孤独的主人公,而我们因此说小说“不具备真正的‘社会’形式和内容”,这是不是公正呢?再说,真正的“社会”形式是什么?达希尔·哈米特的私人侦探可能是孤独的主人公,但这并不是象佩尔斯所说的那样意味着他的小说具有保守性的影响。那些描绘私人侦探的职业如何形成他们的性格和道德观的小说可能提供一种激进的信息和分析。难道还有什么比《马尔他之鹰》或牵涉到“大陆行动”之类的小说或故事能更令人信服地说明社会实践决定意识这个概念吗?多尔顿·特朗博的《约翰尼拿起枪》可以说是意识流手法在小说创作中已被推广的试验,这种手法显然集中描绘书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但这部小说问世时也是一本支持共产党立场的反战小说。总而言之,对 30 年代(或过去任何时候)的作品的意义和政治影响进行评价是一项比佩尔斯能想象得到的更其复杂、更带或然性的历史任务。此外,我在佩尔斯论述的小说中常看到比他的论点所能承认的更其激进的含义。

就整体而言,佩尔斯论述激进戏剧和流行电影的一章就写得比较成功,尽管他对革命电影所下的定义和他对激进小说的概念一样并非完美无缺的。在提到名片《公民凯恩》的导演奥森·韦

尔的时候，佩尔斯说，“他（韦尔斯）似乎懂得，具有革命意义的影片如同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纪实文学和戏剧一样，其作用在于改变人的人生观，提出看待世界的新方法，打破感情和行为的正常模式。”我们确实难以否认，《公民凯恩》是一部伟大的影片或者激进电影的一个作用在于帮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世界。但要知道这部电影是否能打破“感情和行为的正常模式”，那也确实困难的。不过，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辩解：伟大的激进电影或小说的另外一个作用在于加强激进的信念和支持激进的事业。

除此之外，佩尔斯在这一章中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本世纪中最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最受欢迎的几类电影（警匪片和侦探片、喜剧、音乐喜剧、爱情故事、恐怖片及政治性情节剧）⁸、一些出类拔萃的导演（查利·卓别林、霍华德·霍克斯、弗兰克·卡普拉、约翰·福特）以及这10年中摄制的不同凡响的电影。更为重要的是，佩尔斯谈到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拥有的强大潜力。电影和无线电能够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民，它们有助于团结各族人民，创建一个统一的（以及全民的）文化并能迅速地左右国家的舆论。知识分子对这种潜力深感兴趣，但他们终究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媒介以超越“娱乐、消遣及逃避现实的”功能。毫无疑问，美国的大众文化，由于它试图取悦最大多数的读者和观众并适应最普遍的价值准则，必然能够有力地支持佩尔斯的论点：文化具有保守的性质，即使在发生社会危机的年代也是如此。

事实上，这一章的价值，以及以文学为主题的那几章的价值，在于佩尔斯能够识别重要的作品并提出简明的、有见地的文化批评。不管读者在这一章或那一章中可能发现一些什么样的局部问题，佩尔斯无疑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史和文化。在佩尔斯的分析中，知识分子在30年代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这个事实：即使在激进主义年代，美国也是保守的，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评论家所说的程度。由于这个缘故，他使美